

12月12日中午，天下大雨，三个小组集中在戴公祠躲雨，商量下一定的寻找方案。孙晓村在花园内一花台上望着远山凝思……手中拄着竹棍不小心插入土中，竹棍竟一下子陷进去许多。孙晓村觉得蹊跷，下雨天泥土应该更沉实紧扎，这花园土为何如此疏松？赶忙叫民工拿来锄头，未挖几锄，已觉有股腐臭味袭来。

大家顿觉有种希望之光闪现。果然，挖开湿土，露出一具伏卧着的高大遇难者，遇难者脚上连镣铐都未解下，右肩上放有一骨灰盒（后知是杨将军夫人谢葆真烈士的骨灰）。再挖，现出仰卧着的另一20岁左右男性遗体（后知是杨虎城将军幼子杨拯中烈士，又名杨狱生）。

大家非常激动，急忙将情况报告联络处，并上报市委。

重庆市委立即在《大公报》连续几天刊出启事，要求认识杨虎城将军的人士前来联络处，帮助查认遗体。

大约是12月16日，两个原西北军下级军官来到和平路一号，经辨认，确切证实“高大遇难者”便是杨虎城将军。

后来，我们又在花园附近挖掘，陆续发现了杨将军的秘书、中共党员宋绮云烈士及夫人、中共党员徐林侠烈士，宋绮云烈士8岁的儿子宋振中烈士（即难友昵称“小萝卜头”），还有东北军著名爱国将领黄显声将军等遇难者的遗体。宋绮云夫妇与儿子是9月6日同杨虎城将军一道被杀害于松林坡戴笠住处的。不同的是，杨将军受害处是在戴笠会客室，而宋绮云等则是在警卫室。

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通知杨虎城将军的长子、解放军某团政委杨拯民同志来渝，商量办理杨将军后事。杨拯民认为将军生在陕西，叶落归根，要求运回西安。西南军区和重庆市委委托人在江北为杨将军购下一副上等棺木。刘伯承和邓小平认为应该厚葬，以追记杨虎城将军在中华民族危难关头立下的丰功。在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帮助下，杨虎城、谢葆真及随同遇难烈士的灵柩运回西安，安葬于西安南郊韦曲杜公祠西侧。

（责编 晓舟）

中国近代留学运动的奠基人——容闳

● 谢撼澜

容闳（1828—1912），字达萌，号纯甫，广东香山南屏镇（今属珠海人）。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中国近代留学运动的奠基人。

容闳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成长在清王朝走向衰弊夷凌的时代，自小目睹了殖民者践踏南中国的侵略罪行。初谙人世的时候，他不再走传统的封建科举仕途，而是先后就读于澳门英国人古特拉富夫人所办的教会小学和香港玛礼逊教会学校。1847年，主持玛礼逊学校校务的美国教士勃朗因病归国，容闳欣然同往，入麻省孟松学校。1850年，他考入耶鲁大学，加入美国国籍。185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取得学士学位。容闳从小接受西方教育，脑海里深深地打上了西方文明的烙印。



中国近代留学运动的奠基人容闳

府选派秀颖青年，送之出国留学”的“教育计划”(容闳《西学东渐记》)。

为了尽快将其设想变为现实，容闳毅然放弃了美国优越的学习、生活条件，于1855年回到祖国。他先后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等处任职，企图结识清政府上层权贵，以兜售其“教育计划”……结果一一碰壁。1861年，容闳在九江做起了茶叶生意。

1863年，在几个他于上海结识的社会名流的推荐下，容闳被曾国藩邀请去办理洋务事宜。他被派去美国购买机器，以筹建江南制造总局，终于博得了曾国藩的信任。1868年，容闳大胆拿出他的“教育计划”，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上陈协办大学士文祥，请文祥转奏清廷，说服曾国藩，建议派遣留学生。

1870年冬，清廷批准了曾国藩、李鸿章请求在沪、甬、闽、粤等地选考幼童、派遣留学美国的奏折，并专门成立了“总理幼童出洋肄业局”。曾国藩、李鸿章制定了选派留学生的章程，并命陈兰彬、容闳为留学生正副监督，挑选12—20岁的幼童120名，分四批每批30人派往美国。1872—1875年，容闳受命主持选派幼童，并先后在麻省春田、康省哈特福德城盖起了留学生事务所(“选带幼童出洋肄业局”)。这些留学生被分别安置在当地的美国家庭中，在美国友人的精心培育下，逐步融入美国社会，长进很快，“博得美国朋友的好评，使一些一向歧视中国人民的美国人也开始改变了他们的看法”(李喜所《容闳与近代中国第一批留学生》)。

享受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容闳并没有忘记灾难深重的祖国，他希图“借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趋于文明富强之境”，造就一大批像他那样懂得西方政治学说、掌握西方科学技术、通晓西方文明的人来改造中国。他大学毕业时基本上完备了其“由政

然而，清政府在选派幼童出国时也有顾虑，害怕西洋文化把这些孩子俘虏了去，因此规定他们每3个月必须到出洋局进行一次为期半月的华文学习，学习内容为《孝经》和圣谕。泱泱大国的臣民屈身向“撮尔小国”学习，对陈兰彬之类清廷守旧的老爷先生们来说，在感情上是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他们除了群起攻之外，还利用种种借口对学童的学习生活进行干预，不许参加美国人的祈祷，不许游戏、运动，不许剪辫子、穿西服。陈兰彬与容闳因此而矛盾渐深，他连奏清廷，恶毒攻击容闳“偏重西学，致幼童中学荒疏”，诬蔑留学生在美国放荡不轨。清政府听信了陈兰彬的上奏，于1876年将陈兰彬、容闳调为驻美正副公使，改派比陈兰彬更加顽固的吴子登任留学生监督。容闳一再上书要求继续做留学生管理工作，但清廷不为所动。

陈兰彬、吴子登存心破坏留学生事业，竭尽诬陷攻击之能事，昏庸腐朽的清政府不做任何调查而断听了陈、吴的诽谤，并不顾容闳和留学生的强烈反对，不听美国友人的忠告，于1881年下令将留学生分三批撤回。而这些学生中当时只有詹天佑和欧阳庚大学毕业，60多人正读大学，其余还是中学生。

尽管容闳毕生为之奋斗的“教育计划”中途夭折了，但他开创的近代中国留学运动的先河，此后，不断有人赴欧美、日本留学，形成空前规模的留学浪潮。尽管这些留学生回国后受到朝廷的歧视，但后来还是产生了詹天佑、唐绍仪、吴仰曾、蔡绍基等一批杰出人物。而且受过先进思想熏陶的这一批青年，不可能成为大清的顺民，他们终是社会革故鼎新的旗手。

容闳“教育救国”的改良主义思想受挫后，开始倾向革命。1898年，容闳参与维新变法运动。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唐才常等原维新派中较激进的一些人准备在长江流域起事，组织了“自立军”，并在上海张园召开了“中国国会”，容闳和严复被推为正副会长。事败后容闳再赴美国，潜心作传。1910年，容闳邀孙中山赴美商谈，表示支援革命。1909年，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由纽约亨利·霍尔特图书公司出版，书中叙述了他经历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从事教育、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人生历程。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其节译本，改名为《西学东渐记》。

(责编 晓舟)